



Chinese Escapades



中国逃亡记

[英] 狄兰 著 崔书田 编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Chinese Escapade

中国逃亡记

[英] 狄兰 著 崔书田 编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逃亡记 / (英) 狄兰著; 崔书田编译.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209-09151-0

I. ①中… II. ①狄…②崔… III. ①回忆录—英国—现代 IV. ① I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4065 号

中国逃亡记

[英] 狄兰 著 崔书田 编译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青州市新希望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 开 (150mm × 228mm)

印 张 16.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9151-0

定 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译者的话

本书英文原作 *Chinese Escapade* 成书于 1949 年，是潍县乐道院集中营解放后所关押侨民所写回忆录当中最早出版的一部。

作者狄兰 (Laurance Tipton)，曾在英国海军服役担任报务员，后在华担任英美烟草公司销售经理。

1942 年底开始，当被限制于北京城内的同盟国侨民获知将被押往集中营的消息后，狄兰便积极策划逃往延安。其设法找到与共产党有联络关系的侨民，并最终跟北京的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按照地下党提出的要求，组织了延安急需的数名英文教师、医生等侨民，筹集资金设法购买延安急需的药品，计划逃出北京城后前往西山地下党联络点，并转道前往延安。遗憾的是，药品成功送出后，因形势日益恶化，最终出逃计划失败。

1943 年 3 月底，狄兰同其他被限制于北京城的英国侨民一起被押往山东潍县乐道院集中营。入营约一个月后，狄兰即开始策划出逃，并在当地一位进营干活的农民联络下，计划逃往潍县城西北方向 30 公里外的八路军队伍，后因联络人的关系，计划落空。

1944 年 6 月 9 日晚，狄兰与恒安石二人终获成功出逃。次日，二人到达了此次出逃的目的地——鲁苏战区挺进第四纵队司令部所在地山东平度明村镇小河子村，并于当晚转移到此村东去 1 公里许的北郭村，开始了长

期的封闭生活。1945年1月底，日军对昌邑大扫荡期间，二人始跟随四纵队司令部转移各地，后来又再次转回到最初的住所北郭村居住。

由于语言交流问题加上因所处封闭，导致了信息来源的单一、片面，狄兰所描述的诸多事件，难免与译者后来根据相关史料及历经多年调查后所获知的信息有所偏差。为忠实原著，本书未做大的删改，据此，译者在相关行文处对有关人物、事件进行了注释，且许多重要事件发生的地点、人物等，为编译者历经实地调研得出确实结论后首次披露，希望读者在阅读时结合相关注释对原文进行辨析。

崔书田

2015年8月6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 3

1940年1月至1942年2月

第一章	日军审讯	/	3
第二章	宪兵绑架	/	13
第三章	内蒙入狱	/	21
第四章	庭审释放	/	43

第二部分 / 53

1942年2月至1944年6月

第一章	北平假释	/	53
第二章	集中营内	/	69
第三章	苟且偷生	/	87

第三部分 / 105

游击运动

第一章	山东政情	/	105
-----	------	---	-----

第二章 游击将领 / 113

第三章 抗战之始 / 123

第四部分 / 135

1944年6月至1945年8月

第一章 成功出逃 / 135

第二章 并肩战斗 / 155

第三章 接触重庆 / 177

第四章 日军扫荡 / 191

第五部分 / 205

1945年2月

第一章 国共摩擦 / 205

第二章 难堪处境 / 219

第三章 囚徒解放 / 233

附录 目前境况 / 249

成书苦中有乐，心中满是感激（译后记） / 255



第一部分

1940年1月至1942年2月

第一章 日军审讯

1940年1月。

从荒凉的蒙古高原吹来的一股凄冷的东北风掠过南口关隘，卷起沟壑中的枯枝败叶和沙土，向着车厢的窗户扑打过来。太阳，像是黄尘弥漫之中的一轮暗红色的圆盘，已滑落到天际线下方；半个钟头之后，天色就将黑下来了。火车像被推着似的，费了好大的劲才慢悠悠地爬上了陡坡。它穿过隧道，转过马蹄弯，越过跨山桥，从关隘这边的北平平原，来到了关隘另外一侧的蒙古的广袤之地。车厢内，除了蜷缩在对面座位角落里的一个人之外，几乎不见人影。晚餐是炒米饭和几样素菜，已在餐车备好。清冷至此，我便在座位上伸展开来，准备睡觉了。

“证件，行李，检查了！”车厢门被“咣当”一声推开，走进来的日本边防警察喊叫着。此时，我们已越过“边境”进入了“蒙疆”。见我以及我对面角落里那个龟缩在毛皮衣服里的“一团毛”没有动静，边警喊得更加急促了。这显然起了作用。我的那位“旅伴”，花了好大一会儿工夫才从睡眼惺忪中回过神来，并告诉说他是日本人。在连连地道歉、深深地鞠躬以及像是大喘气一样的哈伊、哈伊之后，边警和他的随从警察把注

意力转向了我。检查过我的证件，他们匆忙间离去，却忽略了查看我的行李。他们返回车厢门那里正要穿过时，我对面的那一位旅伴铆足了劲，大声指出他们漏掉了该完成的职责。我从行李架上取下我的手提箱，将它打开。他们粗略地看了一下便又退走了。刚到半路，那位角落里的一团毛又喊住二人，说座位底下还有一个手提箱。我除了借着将手提箱放回行李架上的机会，趁机重重地踩在他的脚趾头上以外，真是拿他没多少办法。剩下的三个钟头的行程中，车厢里明显地充斥着我跟他之间的敌对气氛。

恰好快到半夜时，火车开进了张家口火车站。此时的张家口是日本人摆布之下的“蒙疆”“首府”，以及新组建的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所在地。从火车上走下来，我被来接站的我公司办公室里的中国朋友们热情围住。他们都穿戴着厚厚的毛皮里子的外套和帽子，双脚套在厚重的高筒蒙古毡靴里。互道问候之后，朋友们引领我来到了证件检查室，便悄然退出，约定在出站口等我。检查室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位宪兵中尉和一位沙色头发的年轻俄罗斯人，他自我介绍名叫尼科利。查看过我的通行证等证件，尼科利告诉我，明天上午我得向日本宪兵队、警察署及日本总领事报告，并向当地政府“外交处”申领居住证。在简短地说了一些我可在“蒙疆”随意走动之类的话后，他附带着说了一番话，大意是：如果我认为确有旅行的必要，我一定会在获取通行证方面找他咨询和帮忙的。之后，他以有点微微醉酒的样子跟我道过再见，并颇意味地表示，他日后会经常见到我的。

不久之后我就意识到，这再也不是大约五年前我所知道的那个内蒙古了。过去，虽然此地从未出现过贸易顺差，但它总还呈现出绝大多数边境城镇那种买卖兴隆和交易繁忙的外在景象：街头满是骆驼，背上驮满了蒙古羊毛和羊皮下脚料，并由身形肥硕、浑身油渍的蒙古高原汉子驱赶着；成群的蒙古商人，身着鲜艳的红色、紫色、绛色长袍和高筒毡靴，在大街上游来荡去，身后还跟着保持适当距离的他们的女家眷。这些女眷通常穿着染成了各种红色的长长的袍子，在她们的头发、耳朵、脖子和手腕上面，缀满了镶嵌着琥珀、绿松石和辉石的银饰，腰间围着嵌有琥珀并用红绸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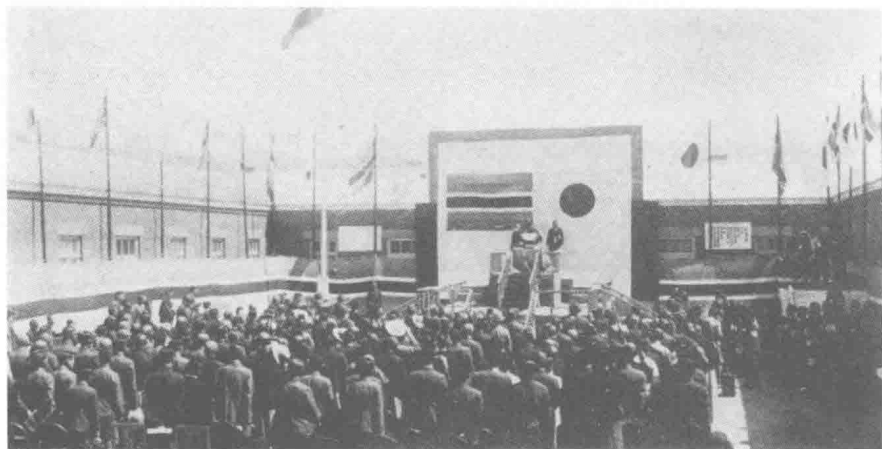
子镶边的银质腰带。有时候，这种美如图画一般的装饰，再绝配上一顶直接取自商店储帽盒的崭新毡帽，它冠顶凹进，只有少女才有的那种精心方能将其恰到好处地戴在头上。喇嘛们手中捏着佛珠，同人群混杂在一起。而相伴这一切的，是泥土路上那繁杂的车辆所扬起的持续不断的尘埃。

而眼下，日本士兵游荡在街头，骆驼商队不允许再出现在城镇里，只有在城郊的小旅店里，方能见到为数不多的几个驼队，跟大街上那喇叭嘟嘟作响、跑来跑去、嘈嘈杂杂的送货卡车相伴着。偶尔地，还是能看到一小队蒙古商人，但眼前已是很少见到有他们的女眷作陪了。不时地，一辆帕克德或别克车扬尘而去，人们只有费上很大的劲才能看得见车中的人头：那些窝在内饰豪华、空间宽阔的车厢里面的矮小日本人、这“蒙疆”的统治者！

城镇已被重新规划了。成百上千的四四方方、廉价简陋的混凝土房子出现了。粗制滥造的新路修建了起来，政府的办公机构也已出现了陈旧衰败的迹象。破碎的窗户用纸糊着，从窗口伸出的镗铁烟囱取代了不再能用的暖气供热系统。在这些办公室里，每一个部门都挤满了戴着眼镜的日本职员和他们的那些过来打发时间的朋友们；还有那些相貌平平、腿短个矮的日本女职员们，常常会不断地续填着客人的茶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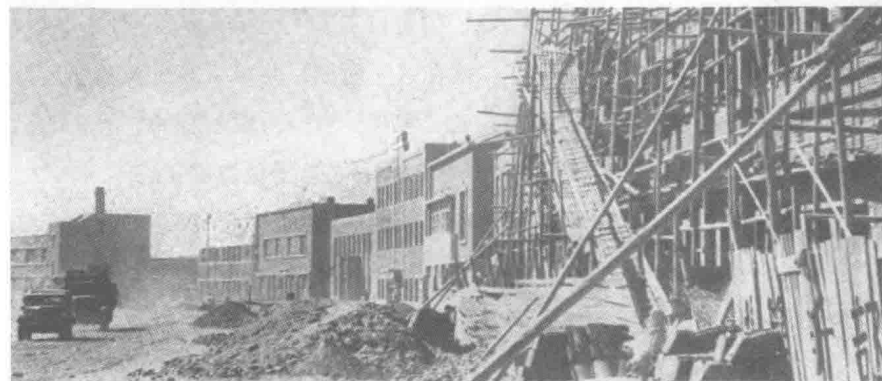
接下来的一年，为了保住在这个新成立的“国家”中的生意，我与所谓的“自治政府”作了费力而又毫无用处的抗争。三十多年以来，我们以骆驼商队的方式往中国西部包括甘肃、新疆等地派送卷烟，生意十分红火。但是伴随着中国军队败走西部至宁夏边界，这一蒸蒸日上的生意被大大削减，我们的供货区域被限制在了“蒙疆”的边界之内。通往华西、新疆、回鹘等地的贸易线路被迫关闭，以至于接下来出口生意缺乏。日本人意图借助扩大印染厂、羊毛纺织厂，以及应用能增加粮食生产的农业机械等手段，来使得这一地区能够自给自足；因而，这一地区竟衰败到了如此的地步，就连进口的物品，也限制在了仅仅是必需的建筑材料和机械这一类。贸易许可被“政府”掌控着，进口许可几乎无法得到。

“蒙疆政府”处于两难之中：它意图除掉我们这个资本主义的“烟草



張家口

近代都市の建設を急ぐ



上图、中图：昭和十四年九月一日，即1939年，“蒙疆”成立大会
 下图：“首府”张家口，都市建设中
 崔书田供图，〔日〕平松幸彦著《蒙古》插图



“蒙疆”货币（崔书田供图）

托拉斯”；但同时，它却又因为从我们的货物上可征得大额税收，能够斩获不菲收入，而心有不舍。最终，它选择了一条折中路线，将我们的进口数量限制在了每月一亿只香烟。进口许可授权给我们

了，外汇结算许可我们也得到了，但是，仅仅比没有稍好点！因为他们根本不给我们结汇的便利，以至于我们攥在手里的，是日益见长的数以百万计的没有用的“蒙疆”货币。

与此同时，“蒙疆政府”也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烟厂。它们迫使农民以远低于时下行情的价格，卖出许多公顷的土地，并开始种植烟草。1941年初，由“政府”发起成立的烟厂开业了。我们的份额立马被砍掉了一半，进口许可更加难以得到了。“政府”跟我们接触，让我们卖掉我们的产业，我们拒绝了。日本军事当局然后便电话通知我们，说我们的产业所占据的场所靠近铁路，属战略要地，因其军事所需，我们必须卖掉。我们又一次做了拒绝，但补充说，如果军队能在我们满意的地方为我们另建一处同样的场所，我们可以考虑出让事宜。我们的进口实际上已接近停滞，到了最后，也就完全得不到任何进口许可了。就在这一时期，我尽力通过灰色渠道减少我们手头上的资金，并准备放弃在“蒙疆”进一步做生意的打算，随后返回了天津，只留下了我属下的一位年轻人，在这里负责留守。

在感到尚未有十足的把握强行占领我们的产业，但又决意以某种合法方式将我们赶出这一行当后，日本官员开始调查我的黑市行为。第一步，日本宪兵编造了假消息，说我们的一位中国顾问得了重病，将其妻子骗至张家口，旋即将其绑架。此后，他们没收了我们的全部公务记录，并给身在天津的我捎来口信，要我到张家口几天，以便处理与我们公司生意有关的“重要”事项。我没有理会它。然而，M先生，也就是在张家口留守的

那位，得了严重的肠道疾患，急需治疗，但日本人却拒绝其离开张家口到北平来。我只好乘上了最近一班火车去往北平。M 先生是美国人，我便来到了美国使馆寻求帮助。使馆这边一个紧急电话打给了张家口的日本领事馆。电话接通后，使馆这边要求即刻让 M 先生返回北平。两天过去了，M 先生并没有在北平现身。最后，我与英国领事见面相商，他像往常一样不作任何应承，我决定亲自出面到访张家口。

到达之后，表面上看来并无任何异常。次日上午，我拜访了日本领事馆，请求他们为 M 先生发放通行证。M 先生虽然眼下已有些好转，但仍急需治疗。除了他的健康状况之外，颇为明显的是，在现时的状态之下这里也没有他这个美国人的安适之处了。总领事表示了歉意，指责了宪兵拒绝为其签发旅行通行证的行为。我接着到访尼科利，他立马为 M 先生开出了通行证。M 先生便于当夜离开，去了北平。

第二天上午，尼科利打来电话通知我，说日本宪兵希望就事关我们公司的事宜见面质询我。我拒绝过去，指出除非他们以武力相逼使，否则只有在他们释放我公司中国顾问之妻以后，我才能离开我们的房子。我对他说，难道宪兵队那边设施齐备，能妥善处理好孕妇的事情吗？难道他们没看到她怀孕日久，已是待产之身吗？（她是一位极为肥胖之人，我撒的这谎也就自始至终没有被揭破。）他便说道，我肯定是误会了——他从未听说过她的事。不过，两个钟头之后，她便被释放出来，而且日本人都道了歉——仅仅是一个弄错了身份的小事而已。

同时，我发电报给在天津的日本顾问水野先生。水野是挺招人喜欢的一个人，在美国接受的教育，曾游历欧洲并与一位德国女子结婚。他爱好饲养牧羊犬，而且作为一个日本人，有着相当的幽默感。他到达之后，我们借着几杯威士忌，对明天前景如何进行了探讨。这是他专为消解这些令人不快的小插曲，并给我们提神鼓劲，而专门带来的几瓶酒。

次日上午，我们出现在了宪兵司令部。在大厅迟迟等待之后，我们被领着穿过了那免不了有些昏暗而且散发着霉味的长廊，进入到一间被一只大灯泡照得通亮的房间里。一位穿着破旧、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头耷拉着，

人被绑在椅子上，两手平摊在桌面上。两位日本人一边一个坐在他的身旁，还有另外一个，站在他的身后。他的食指跟中指的指尖，仍旧在淌着血。桌面简直就是一片血污之地。日本人在抽着烟，其中的一位，还在不时地把玩着手里的老虎钳。一条浸满鲜血的小毛巾、两个空烟盒、一只满是烟蒂的烟盘，散乱地丢在桌面上。空烟盒的翠绿，与烟盒置身于其中的那一片血淋淋的鲜红，形成了奇怪的对比。领我们进来的这位日本人装出极为尴尬不安的样子并深表歉意，迅疾将我们推出房门，又深深地弯腰鞠躬将我们恭迎进了相邻的另外一间屋内。这次走对地方了。一位身材粗短的日本人，整整齐齐地身着宪兵制服，正坐在放满了我们的账本和大量凭证的桌子旁。他看起来有些困惑不解的样子，同时，见到我们后便松了口气。我并不过分担忧，我有十足的把握，他在我们的账本里，是不会找得到用以指控我们破坏外汇兑换条规方面的任何纰漏的。在六个钟头之内，我们回答着、争辩着、解释着，与之相伴的是隔壁房间里那不断交替出现的尖叫声、呻吟声以及告饶声。它是那样血淋淋的真实，明摆着是故意冲我们而来。一个人是有可能去承受这么长时间的折磨的，中国人，同其他的人们一样，也仅仅有十个手指甲盖。人类在恐惧、疼痛及遭受折磨时，会以同样的方式尖叫和呻吟，而尤其是这几人同为中国人，其表现出的情形则更会是相同的。虽然难以弄清楚，但在我们被质问的六个钟头里，可以肯定至少有三到四位中国人被折磨过了。

在如此令人不安的情形之下，我抱定决心不表露出任何表情反应。水野已是脸色苍白，以致带上了灰绿色。我记得曾在心中暗暗希望自己不会做出相同的反应。三个钟头过后，即使借助于接连不断地抽烟和一杯杯地喝茶，一个人对反反复复的提问也难以再集中精力了，并且竟然还产生了一种对疼得尖叫的声音的持续期待感。有时候会有半个钟头的安静，然后，这期待时的紧张感，一下子会被那几乎非人的声音弄得松弛下来。在五个半钟头过后，我实际上已是浑身湿透，在我动弹脚趾头时汗水会顺腿而下，在鞋内挤来压去。我早已不想作任何更多解释，便只以“是”或“不是”作答。我们的那位审问者看来也不再有着起初的那股子兴致，最后他合上账本，